

白城地区东北抗联口述史

义勇军之兴起

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，侵占了东三省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。

当时在瞻榆县境内，反满抗日活动的组织纷纷成立。在李芳廷、胡必烈等人的带领下逐渐联合，成立了义勇军，最后发展到3000多人。

据伪满档案记载：“大同元年3月1日，宣布伪满独立。对此，胸怀不平的反满抗日分子，在各地纠集乌合之众，以致阻碍国家前途。”“地处偏僻之我县，为其盘踞之地，进而骚扰作乱。并因该等之煽动，县民附和者达三千人，组织了反满抗日义勇军。各地示威，因此地方治安极度混乱。”

义勇军旗帜鲜明，枪口直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。在义勇军的打击下，伪政权惶惶不安。曾采取了“肃正”治安政策。于1932年（伪大同元年）5月4日，调驻在洮南的警备司令张海鹏，对义勇军进行讨伐。张海鹏率伪军3000多人，向瞻榆方向进发。但伪军怕义勇军的英勇，行动非常迟缓。义勇

军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对敌情进行了认真分析，最后研究决定，一方面做积极的迎敌准备，另一方面派出专人作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。提出：“枪口对外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的口号，并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投诚起义办法。这项工作很有成效，得到了敌人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同情和赞同。有一部分伪军反水投诚。在战术上，义勇军采取向热河方向假撤退的办法，诱敌深入。张海鹏听说义勇军退了，急催讨伐队追击。伪军追到热河之后，没等打仗，讨伐队就哗变了。当时有2000多人投向义勇军。剩下的讨伐队不战自溃，狼狽逃散。这一仗义勇军扩大到5000多人，军威大振。

在热河经过短暂的整顿，于五月中旬义勇军又返回瞻榆。由于投诚这些人不坚定，加上敌人搞策反，里勾外联，约有1500人离开了义勇军。剩下坚决抗日到底的3500多人，组成了独立团，进一步开展打击日寇占领区的斗争。

独立团成立后，直捣瞻榆县城。伪政府惊慌失措，县长逃跑四区集贤村躲避起来。留在县里负治安责任的警察队员害怕义勇军，有的自动离职，有的投向独立团。日本侵略者不甘失败，又动用了空军袭击。在7月22日和26日两次调用军用飞机，对县城和其他驻有独立团的地方进行轰炸。义勇军没有伤亡，炸死炸伤了几个居民，炸坏了一部分房屋。

日本侵略者企图消灭义勇军，又于10月16日调集洮南、辽西警备军再次讨伐。义勇军得信以后，有计划地撤到鲁北一带，使敌人这次讨伐扑了个空。到大同二年4月28日，日本侵略者派神捧到瞻榆县任参议官，实际超过伪县长的权力，是地方伪政府的决策人。同年8月15日，又派来一个松户警务指导官，强化警察机构，镇压老百姓。但反满抗日斗争并未停止。想肃清义勇军是办不到的。义勇军分散在农村各地继续开展活动，直接威胁伪政权的建立。这期间日伪

军警曾多次出击，但日伪军每次出动都以失败而告终。

1933年11月，一部分义勇军及地方抗日武装五洋等六部，联合兵力，集合部署，据守二区王家窝堡屯。伪县警察队又进行讨伐，到24日在刘子厚屯，双方进行了一次激战，义勇军在群众支持下，迂回出击，英勇善战。伪警察队日本绪方指导官及伪警官均被击毙。次日，独立守备队闻讯赶来增援，于二区二龙山一带相遇，激战数小时，江本等十余名日军被消灭。这一仗日本鬼子伤亡惨重。后来日本鬼子为追念这些所谓的“县政治治安守护神”，还在县城北土岗上鬼王庙附近修筑一个“忠魂碑”（这个碑1946年解放后炸掉）。

由于群众坚持反满抗日，加上义勇军的活动，使伪政权几无宁日。直至1935年9月，日本第十六师团门胁部队，打着宣传皇道的旗号，进驻了瞻榆。日伪军联合搞起了所谓疾风闪电式的“肃正”，义勇军终因平原作战，无险可守，无林可据，再加上供给不足而退却。

义勇军虽然退走了，但在瞻榆一带的抗日活动，却深深地印在人民心中。（六十七）（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）

白城记忆

儿歌不能『涨价』，应该上新

侯江

“我在马路边，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……”这首由“儿歌大王”潘振声创作的《一分钱》，告诉孩子一个朴素的道理：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；哪怕是小小的一分钱，也绝不能据为己有。

这首儿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，没有想到近日出了“新版本”，原本的“一分钱”，被改成了“一元钱”，引起网友热议。有人觉得，一分钱钢镚差不多退出现实生活，一元钱是如今孩子们能见到的最小面额的现金，改动一下无伤大雅；但更多人认为，随意改动经典，有可能产生误导，让孩子们觉得善行与钱的多少相关。作者潘振声的女儿对改编也不认可：“爸爸这首歌写的是孩子天真无邪，捡到钱要交给警察叔叔，跟物价飞涨没有什么关系。尽管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但经典就是经典，我们今天唱来仍然可以体会当时创作者的心血。改成这样，唱起来不觉得拗口吗？”这种改写并未征得已逝原创者家人的同意，还涉嫌侵犯知识产权。懂懂的孩子也许就会认为，“一元钱”是原创。

确实，孩子们很难再捡到一分钱了。由于时代的变迁，物价水平、薪资收入已经有了大幅上涨。一元钱是一分钱的百倍，可是，原创歌曲中“一分钱”的含金量，真的变了吗？“一分钱”的取与舍，正是启蒙教育的必备内容，正是把对社会公德心的培养落实到了最细微处，正是对孩子世界观、人生观的一种亲切的熏陶，根本与钱的数额无关。遇到一分钱、一角钱、一元钱，甚至是百元大钞，不是自己的，就一定要上交，这是自我与他人边界的认知，是做人的基本准则。

机械地改动经典，暴露出一些教育机构、一些出版机构是在非取舍、法律意识和历史修养上的无知与莽撞；老儿歌“涨价”，同时暴露了新时代儿歌作品的短缺。如今的孩子，对过去的经典难免有些隔阂，自然期待更多与时俱进的新儿歌出现。改动流传了几十年的经典，以“编新不如述旧”来偷懒，甚至去丑化或者消解，恰恰暴露了儿歌领域创新力的匮乏。老儿歌传唱不衰，新儿歌佳作不断，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寓教于乐带来的最大收益。

琴台善政

崔洁 黄海啸

提起古琴，人们常会想起春秋时的“琴圣”俞伯牙，可叹这位“琴圣”的知音，只有钟子期一人。钟子期亡故，俞伯牙摔琴谢知音。而唐朝开元年间，有一位县令，不仅让古琴艺术变得雅俗共赏，还把琴台当作“审音理政”的窗口，全县百姓都成了他的“知音”。这位“抚琴与民同乐”的县令就是元德秀。

元德秀（695年—754年），字紫芝，河南洛阳人。年少丧父，事母至孝，曾背着母亲进京考试。开元二十一年（733年）登进士第，任邢州南和县尉，因施政有方升为龙武军录事参军，后因车祸伤足辞去军职。因家境贫寒，于开元二十三年（735年），自求任鲁山县令。

鲁山地处偏僻山区，盗匪横行，虎患不绝，原任县令弃官而去。元德秀上任后，抚流民，修水利，兴农桑，治盗匪，群众渐渐安定下来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有个盗贼被关押在牢里，当地正碰上老虎作恶，盗贼请求打虎赎身，元德秀答应了他。有属吏对元德秀说：“那是盗贼的诡计，将来他逃走

了你，不是要受到牵累吗？”元德秀说：“我已经答应了，不能背弃约定。如果有牵累，我当承担罪责，不会牵连到别人的。”第二天，那人带着老虎的尸体回来了，全县的人都为此而啧啧称叹。

唐玄宗在东都时，曾在五凤楼下设宴，命令三百里内的县令、刺史都要拿出歌曲来进献。当时人们都传言玄宗将要对所献歌曲曲出优劣，施加赏罚。为求封赏，河内太守用车装着几百个演员，披挂着锦绣，甚至有的装扮成犀牛、大象，十分新奇瑰丽。只有元德秀不愿劳民伤财，只带了乐工几十个，联袂唱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歌。玄宗听后，十分惊奇，赞叹说：“唱的都

是贤人之言呀！”又转而对宰相说：“河内府的百姓恐怕都生活在苦难中吧？”于是罢免了河内太守，元德秀因此更加出名了。

为感谢这位好县令，开元二十四年（736年），鲁山乡绅和民众自发组织，捐资为喜欢弹琴读书的元德秀倚旧城墙修筑了一座琴台，以示庆贺。此后，元德秀常在琴台上读书弹琴，处理政事，与民同乐，史称“琴台善政”。

元德秀一生清廉，所得到的俸禄全都用来供给孤儿弃儿吃饭穿衣。县令任满，他用来自盛物的竹筐里仅剩一匹细绢，便赶着一辆柴车离任。定居陆浑时，他的住宅不造围墙，不设门锁，也没有

仆小妾。元德秀喜欢弹琴，擅长作文，写了一篇《塞上赋》来自比。宰相房琯，每见元德秀，叹息曰：“见紫芝眉宇，使人名利之心都尽”。成语“紫芝眉宇”即来源于此，形容人德行高洁。

天宝十三载（754年），元德秀去世。死时家里只有枕头、鞋子、竹盆和舀水的瓢一类东西，可见其两袖清风。司马光称“德秀性介洁质朴，士大夫皆服其高”，一代大文豪苏轼也发出“恨我不识元鲁山”的感慨。

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元德秀“琴台善政”的故事，千百年来一直为文人墨客所歌颂。明代诗人姚裕在《琴台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琴台百尺枕苍苔，今日登临忆往年。漫想紫芝为政暇，几多情思付丝弦。”明代成化年间，鲁山教谕陈敦在《琴台善政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贤侯德政爱民深，百尺高台静抚琴。一曲清风弦上调，满腔和气轸中吟。伯牙昔日堪同操，单父当年不易心。高山流水非独乐，至今追慕仰德音。”高山流水何其美，与其独乐，不如与民同乐。

视点

四百年前，畅销书作家是怎么“打击盗版”的？

任思雨

在四百年前，有一位理念超前的“奇人”：他是知名畅销书作家、是出版社老板、是编剧兼导演、戏剧理论家、美食家、园林家、养生达人……

他写下的《笠翁对韵》是儿童熟悉对仗、用韵、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；《闲情偶寄》被林语堂称作“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”；他支持出版的《芥子园画谱》被齐白石等画家视为经典教材，流传至今。

更有趣的是，他还是古代率先向盗版开战的文人，四百年前，他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著作权，誓要与盗印者“决一死战”。他是谁？他又是怎么做的？



一个畅销书作家的诞生

1611年，李渔出生，同很多天才的开头一样，他从小就聪慧无比，四书五经过目不忘，十岁便能赋诗作文，下笔千言。

24岁那年，李渔考中了秀才，但4年以后，他再赴杭州参加乡试却不幸落第，复读了两年再考还是不中，想到而立之年一事无成，他就伤心不已。

就在他埋头复习考试的这几年，明朝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，李渔感到仕途抱负实现无果，于是便决定放弃，选择在隐居在浙江兰溪夏李村等待，后来，他又举家搬到省城杭州，做了一名“抗漂”，而他轰轰烈烈的后半生，此刻才刚刚开始。

明清时期，戏曲艺术极为发达，人们热爱看戏，戏楼戏班也对剧本有着大量的需求，李渔瞅准了这个机会，便打算“卖赋以糊其口”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卖文为生”，成了一位“自由撰稿人”。

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文采斐然的大家，但很少有人真正完全靠着写作维持生计，李渔敢做，而且他真的是把自由撰稿人做到顶尖儿的代表。

李渔从小熟读经典、精通音律，又思想敏锐、敢说敢做，写起戏自然是来得得心应手，在旺盛的创作精力下，他先后写出《怜香伴》《风絮误》《意中缘》《玉搔头》等戏剧，往往十几天就能写出一部。他的作品新奇有趣、富有娱乐性，即便写男女谈情说爱，故事也比其他人精彩许多。



李渔的作品被当时的许多文人所不齿，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，但在市场上，他的书往住一经问世就被抢购一空，甚至写了一半就被拿去拍，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“所制词曲，为本朝（清朝）第一”。直到今天，许多剧目还以多种形式反复上演。

在国内火爆的同时，李渔作品也早早走出了国门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就曾在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中提到：“德川时代之人，苟言及中国戏曲，无不立举湖上笠翁者。”

打击盗版：“誓当决一死战”

随着戏剧和小说作品的火爆，李渔的“湖上笠翁”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，但盗版的烦恼也随之而来。

一些盗印者是守着李渔的新书一到，便自己在家大量翻印、销往市场；还有一些不良书商更甚，趁李渔没有更新时便找来许多无名书稿，直接冒充“湖上笠翁”的名字摆上书摊。



辛辛苦苦写书养活一个大家庭的李渔，自然不甘心被人窃取劳动成果，他四处奔走，与人打官司，清初，朝廷管理苏州、松江两府的机构称苏松道，他通过关系找到苏松道台孙承承那里告状，终于查处了一起严重盗版事件。

那时，金陵城的盗版现象猖獗，李渔便决心搬到金陵，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书屋，名为“芥子园”，决定“自产自销”——自己写书，自己刻书出版、自己卖书，最大程度地减少盗版给自己带来的损失。

他给每本书都印上自己精心雕刻的“芥子园”印章，作为李渔正版新作的标记。



除了打官司、印商标，李渔还在自己的书里严词警告不法书商：自己的书严禁盗版翻印，如果有人“或照式刊行，或增减一二，或稍变其形”，就是“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，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，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”。

可以说，李渔是最早有版权意识的古代文人之一，他非常坚决地捍卫自己的著作权：“至于倚富恃强，翻刻‘湖上笠翁’之书者，六合以内不知凡几，我耕彼食，情何以堪？誓当决一死战，布告当事。”

爱玩会玩的生活家

没想到的是，本意在金陵城打击盗版的李渔，又开始了另一段辉煌的文化产业：

在芥子园书铺，他不断引进印刷技术，除了印刷自己的作品，还重新审定编辑了很多名著，如“明代四大奇书”：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。

他还根据读者需求推出一系列插图本、袖珍本，后来“芥子园”书铺屡经转手，但由李渔开创的传统一直保持着，让芥子园成为清朝出版业的著名品牌，沿袭二百多年。

由芥子园书铺出品的最知名图书，还要数《芥子园画谱》。许多成名的艺术家都是从此入门，齐白石曾在这本画谱中，自己二十岁跟着师傅做活时发现了这本画谱，“好像是捡到了一件宝

贝”，他借来一幅一幅地勾影，足足画了半年，最后钉了16本。

多才多艺的李渔，除了身兼作家、商人、编剧，还是个“导演”，是个爱玩会玩的生活家。

李渔向来对戏剧情有独钟，而且对戏剧理论相当有见解，他经常担任教习和导演，自编自导了很多精彩剧目。

56岁那年，李渔应朋友之邀出门远游，先后于山西临汾、甘肃兰州幸获贵人相赠的乔、王二姬。二姬颇具戏剧天赋，李渔如获至宝，他当起编剧、导演、经纪人，组织家庭戏班开展“全国巡回演唱会”，“全国九州，历其六七”，每到一处，都会受到当地名流的热烈欢迎。

在李渔六十岁那年，《闲情偶寄》问世，这是一部关于戏曲艺术以及生活美学的作品，内容涵盖园林设计、室内装饰、梳妆粉黛、烹调艺术、居室器玩、如何消愁解闷、如何养生、防治疾病等方面……



《闲情偶寄》以“生活”为主题，李渔把日常生活中的闲情琐事搬进书本，对一草一木皆有感情，作家林语堂说，这本书是“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”。

在风雨飘摇的年代，李渔仍存有最天真的童趣，他在《笠翁对韵》中用美好的韵律写下了世间万物：“天对地，雨对风。大陆对长空。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。雷隐隐，雾蒙蒙……”

可惜的是，就在李渔的事业正红火之时，一场变故发生了，公元1672、1673年，他心爱的乔、王二姬因病先后辞世，李渔伤心欲绝，写下《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》《重过江州，悼亡姬，呈江念鞠太守》《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》哭悼，此后，李氏家班不再复往日辉煌。

公元1680年正月十三，古稀之年的李渔于贫病中逝世。后世对他的评价有多种样貌，但大家都必须得承认，这位潇洒又有才的奇人，为中国的文化事业留下了灿烂的一笔。